

戦後日本語計画一瞥

石 剛

要旨:戦後、日本は70年の間、一連の言語計画をうち立ててきた。その歩みの中で、「国語審議会」(2001年から文部科学省「文化審議会国語分科会」)が主導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なお、1970年代以後、「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教育振興協会」など、政府系および半官半民か民間の組織も多数立ち上げられ、言語政策の企画推進と実施に加わり、それぞれ異なる役割をはたしながら連携しているような体系をなしてきた。その実態についてはすでに数多くの研究があったが、本文では時間軸に沿って、「国語審議会」を中心に、これら組織の活動を整理したうえで、日本の言語計画の特徴を東アジアという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における意味を探ってみた。これにより、東アジア言語思想史という視座を生かしながら、アジア地域諸国の言語政策比較研究を試みる地ならしと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国語審議会、文化審議会国語分科会、言語計画、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普及

Abstract: In the past 70 year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Japan has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The Japanese Language Council or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is a leading role in exami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language policy. Th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Japan Foundation,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planning. All of these institutions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devoting to building up the network of the language planning of Japa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nature of work,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analys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brief.

Keywords: The Japanese Language Council,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he Japan Foundation, language plann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1. 引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过了70年。这段历史作为巨大的转型期对于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日本从战前走侵略扩张的道路转而进入了经济发展时代，在国家形态以及语言战略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在近代东亚各国中，日本较早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家语言战略规划作为构建近代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大概可以举出以下两点。其一，日本作为亚洲诸国之中最早实现近代化也是唯一跻身列强的后起帝国，在其建立过程中，必然面临军事、政治、国家国民统合以及对内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紧迫的现实需求，这就凸显了采取语言战略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其二，更深刻的原因，或许还必须从日本建立近代国家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范式的初始阶段，就较早导入了西方近现代国民国家，特别是德法等国的民族主义语言思潮这一语言思想史的脉络中，去追根溯源^①。

如果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结合政治外交军事等其他因素，似可以将近代日本的语言规划史粗略划分为以下三个具有显著不同特色的阶段。

(1) 明治初年到明治28(1895)年(计28年)。

(2) 1895年至1945年(计50年)。

(3) 1945年至2015年(计70年)。

以上三个大的阶段中任何一段，都可以再细分为几个阶段，在此不赘述。本文叙述的对象仅限于其中的第三阶段，即战后日本的语言规划史。对这段历史，曾有日本学者试做过如下分期^②。第一期：日本战败导入民主制度之后的国语改革的初创时期(1945年-1966年)；第二期：现代日语书写规范的重构时期(1966年-1991年)；第三期：国际化·信息化时代的语言规划对策的变革时期(1991年至今)。承担日本语言规划任务的主要机构是“国语审议会”(国语审议会存在时间为1934年-2001年，2001年改组成为文部省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文字改革或书面文字系统的创制是语言规划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③，而国语审议会(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日本的语言本体规划工作，如调查和审议日本语言状况，提供语言规划和改革方案等，国语审议会(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在日本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此外，在日本国家语言战略中，还有一个机构不容忽视，它就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国语审议会不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较晚，其主要目的是向海外推广日语和日本文化，提高日语和日本文化在国际中的地位，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除了国语审议会(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这些政府直属组织之外，还有大批民间机构参与日本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方面的活动。它们有些是在政府方针的影响下“自发”出面承担一系列相关工作的，也有些是受到政府批准、委托或资助来开展活动。例如“日语教育振兴协会”、“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国际日语普及协会”、“日语教育协会”等，有的机构在获得政府认可的情况下代行部分行政职能，辅助国家落实语言规划政策，贯彻国家的语言方针。

国语审议会(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语教育振兴协会等在日本语

言规划工作中职责各异,互相配合,为日本语言战略这一共同目标服务,从不同角度推动了语言规划事业,是日本制定推行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国语审议会·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

“国语审议会”是政府设立的一个负责调查、审议与制定语言政策的部门,它最初成立于1934年,在1949年进行过改组,直至2001年,日本全面改组其政府机构,撤消“国语审议会”,改由文部科学省(原文部省)中“文化审议会”的“国语分科会”承担原“国语审议会”的全部职责。

围绕“当用汉字”、“常用汉字”、“现代假名用法”等重要语言规划课题,“国语审议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日本语言政策的蓝图,并保存下长达7500页的会议记录和报告原本。日本的语言政策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系统性和传承性。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从急于构筑近代国家和帝国体制的明治时期,到后来对外扩张,发动战争,实行殖民地统治,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和普及日语,再到战败投降后构建民主国家·经济起飞,最后到国际化时代),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重大变化。本节主要通过梳理国语审议会(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的活动,了解二战结束后关于日本语言政策在规划方面的来龙去脉。

2.1, 战后初期的主要活动与成果

日本战败后仅3个月,即1945年11月,就召开了“国语审议会”第八届总会,审议“标准汉字表”。其后在一年中,其下属的“汉字主查委员会”召开了数十次会议反复讨论,终于制定出了“当用汉字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最权威的语言学家、语言政策学家以及学界泰斗^④。“国语审议会”在战后初期制定的主要语言规划有以下几项:

- (1) 1946年11月制定并公布了“当用汉字表”(1850字,内收131个简化字)。
- (2) 在制定“当用汉字表”的同时,确定并公布了“现代假名使用法”。
- (3) 推动“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使用法”在各领域的普及。

战前,日本文部省于1921年设立过一个“临时国语调查会”,该委员会于1923年曾经制定了一个“常用汉字表”,这个表规定的汉字在当时的各大新闻媒体、杂志报刊上等得到了一定遵守和使用,但是政府机关等却几乎无视它的存在,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书写和发布公文。1942年文部省又在国语审议会拟定的《标准汉字表》(2528字,内收142个简化字)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标准汉字表》(2669字,内收80个简化字)。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并未能够在全国得到实质性实施。二战以后,“国语审议会”在参照原“常用汉字表”的基础上,开始了“关于标准汉字表的重新探讨”。但是在应该保留多少汉字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到1946年5月第十次总会召开,仍然没有能够正式制定出统一的常用汉字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讨论,新设立的“汉字主查委员会”,终于在1946年11月,制定出法定使用的汉字表,定名为“当用汉字表”并公布。

“当用汉字表”规定了1850个汉字为“当用汉字”,即可以正式使用的汉字。其中简体字有131个。

除前言和字表之外，还详细规定了“使用中的注意事项”。该字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限制了汉字的使用字数，明确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并从此正式推行简化字。但是并没有对汉字的构成要素进行体系化改变，仅仅参照惯例，将个别汉字作了部分省略。1946年，这个“当用汉字表”出台之后，作为行政法规，得到了政府机关的重视和遵守，这象征着战后日本的语言规划在限制汉字和国语改革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⑤。

应该注意的是，1946年3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GHQ）邀请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来日本考察，并于3月31日发表了相关报告书，该报告书指出了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的弊病以及使用罗马字之便利等。这个报告书对于战后日本语言规划的制定以及语文的改革走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其次是“现代假名使用法”的确定。“假名”是相对于“真名”（即汉字）来说的，指日本在汉字基础上加以改造而独自创造的文字，它在日本文化史和语言生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假名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没有进行过权威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时代用法各异，十分繁复。有鉴于此，作为语言规划的一项重要，在制定汉字使用规范的同时，假名使用方法的改革几乎也在同步进行着，这项工作主要由“假名使用法主查委员会”承担。这个委员会制订了新的假名使用表，称为“现代假名使用法”表。“现代假名使用法”以现代日语口语的发音和习惯为基础标注假名，一改旧有的复杂艰涩的假名标识方式，一般认为，这项改革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有助于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和语言生活效率。

最后就是推动“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使用法”的普及。“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使用法”公布后，得到日本报刊杂志等媒体广泛使用，日本政府于是趁热打铁，发布命令将它推广到全国各个学校的教育中。“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使用法”适合现代日语口语的特点，在学校教育中容易被学习者接受。这样，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使用法的普及就像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潮流一样，在推行和实施中几乎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在全国各地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以上三项是战后初期“国语审议会”所制定并推行的主要语言规划。

在此前后，国语审议会提议设立一个“基础性调查机构”。文部省采纳了这一建议，于1948年设立了“国立国语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一个专门负责对语言文字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旨在为国语改革提供大规模的、科学性、基础性的资料调查依据和研究成果，为制定语言规划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国语审议会根据国立国语研究所的基础性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语言规划立案，文部省的国语科则负责行政方面的实施工作。至此，日本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国语政策体制，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进一步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

国立国语研究所成立后，日本政府于1949年又对国语审议会进行了改组，明确其作为政策立案审议部门的功能，审议会的委员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组织和团体，委员的产生过程也完全来自上述组织和团体的推荐。至此，国语审议会蜕变为带有独立性性质的、智囊型的审议决策机构，淡化了原有的官僚烙印，增添了一些民主色彩。

2.2, 国语审议会语言规划的系统构思与建树

改组后的第一期国语审议会, 向文部省提交了一份题为“国语问题要领”的提案, 提案的主要内容为: 1、关于国语改良诸问题。2、关于振兴国语教育诸问题。3、关于罗马字(拉丁拼音)诸问题。在这中间, 政府公文和法令用语力求亲民化(让民众读得懂)和规范化, 人名汉字用字力求规范, 敬语使用力求简易等问题, 都成为了议论的重点。这个“国语问题要领”的积极意义在于, 从民众接受的角度来提出探讨语言规划的方案, 这也为其后几期国语审议会提供了继续深入讨论的重点课题。

第二期国语审议会制定的主要提案中, 涉及日语罗马字拼写以及外来语标记的规范, 町村合并后所产生的新地名的标记方法, 改善法令用语的具体措施, 以及当用汉字表的修改和补充等内容。特别是此次会议期间, 初步形成了构建日语“标准语”的设想, 而与“标准语”相对的“方言”文化问题也随之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注。

第三期国语审议会在1954年至1956年召开。这一期会议审议的议题和项目, 主要围绕假名的教授方法、口语的改善、规范正字法、同音汉字的替换规范、罗马字教育、按学年教汉字等内容展开。

1956年12月, 第四期国语审议会召开。本期会议较为重要的议程之一, 是制定“送假名的书写方式”。然而在“送假名的书写方式”的审议之初, 对于国语新政的意见分歧已经初见端倪。早在1946年政府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和“假名使用法”之后, 慢慢有不少学者对这个新的书写规范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这样的新政策会破坏日语原有的历史文化底蕴, 因此, 在语言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改革推进派”(支持派)和“传统重视派”(反对派)的论战。

在1961年第五期国语审议会委员选举环节中, 机构内部的“改革推进派”和“传统重视派”(俗称“表音派”和“表意派”)的矛盾对立达到了高潮。1949年改组后的国语审议会委员, 是通过国语审议会内部的“推荐协议会”提名推荐方式产生的, 而“推荐协议会”的成员, 又是由国语审议会内部成员通过“互选”的方式产生。这种选举方式表面上是民主的, 然而当机构内部出现对立的派别时, 情况就另当别论了。第五期国语审议会会议接近尾声时, 按往常一样迎来了重组“推荐协议会”的“互选”环节。在这一环节中, “表音派”和“表意派”之间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 以致于五位委员当场退席。这一事件更是被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1961年11月9日, 文部大臣在第六期国语审议会(会期1961年至1963年)上出面调解双方的矛盾, 这也促使国语审议会后来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改换思路, 谋求变革。基于此, 第六期国语审议会提出, 既要尊重传统, 也要注重革新, 要协调发展。此外, 还提出要进一步细化语文改革的课题, 比如要厘清语文改革在学术、文艺和社会教育上的不同作用, 针对口语、书面语、文字、语句、文法、文体、发音、标记法、罗马字、地名、人名等方面都提出了更详细的规范要求。

自1962年起, 国语审议会由原来自主性较强的审议部门转变为文部大臣的咨询机构, 委员的产生不再通过“推荐协议会”的方式, 而是改由文部大臣直接任命。这标志着国语审议会由民间学者主导型机构向政府导向型机构的转变^⑥。

1964年的第七期国语审议会就是在这个新规则下举办的。50年代末以来, 表音文字化的呼声愈发高涨, 这引起了表意派的警觉。1964年, 代表表意派心声的“吉田提案”就提出, “国语应该以汉

字假名混合的方式作为标记的正统规则”，以对抗“全面废除汉字”论。这件事引起了政府关注，于是政府相关负责人员几次出面澄清，政府方面不会全面废止汉字的使用，直到中村梅吉文部大臣出面表态之后，表意派才如释重负。至此，日本政府在汉字的使用或废止的问题上已经给出了定论这一说法不胫而走。

召开第八期国语审议会时，正值国语政策的转变期，文部省·文化厅开始通过现场考查或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收集基层关于国语改革的意见。这个时期，执政的自民党也开始展示出了要积极参与国语政策问题研究的姿态，并于1966年在党内成立了“关于国语问题的小委员会”，对国语问题进行审议，表明其尊重传统、革新未来的语言施政观。

1966年到1972年的六年中，相继召集了第八、第九和第十期国语审议会，主要完成了“当用汉字改定音训表”和“改定送假名的使用方法”的修订，提出了“关于振兴国语教育”的提案。

“关于振兴国语教育”的提案，目的在于构建一套“简明、准确、美丽、丰富”的国语体系。这标志着战后语言规划的重点逐步转向了对语言使用和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视层面。提案认为，国语是日本人的性格形成和自我充实、社会进步与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国民思想与文化的基础，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提案具体规定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几个领域的教育内容。在国语书写规范标准的大讨论吸引着全社会的目光的关头，可以说“关于振兴国语教育”的提案也占据了一席特殊的地位，在2004年文化审议会公布新的教育提案之前，“关于振兴国语教育”这一提案所传达的信息一直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日本。

从1972年召集的第十一期国语审议会，直到1981年的第十四期会议，设置了专门负责具体工作的汉字表委员会^⑦，主要审议“当用汉字表”（包括别表）以及“当用汉字字体表”，旨在制定新的汉字表。在收集大量汉字使用状况调查资料基础上，汉字表委员会对4200个汉字逐字分析，最终于1981年10月发布了“常用汉字表”，取代“当用汉字表”（1945字）。这个新字表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

在“常用汉字表”制定以后，1982年到1986年举办的第十五期、第十六期国语审议会将重点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现代假名使用法”，制定了新版的“现代假名使用法”。

1986年到1991年的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国语审议会重点制定了“外来语的书写规范”准则。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国语审议会都没有制定过正式的日语外来语书写标准，这个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战后日语书写规范的制定和改革工作告一段落^⑧。

2.3 语言规划谋求在新时代与时俱进

1991年到2000年的第十九期至第二十二期国语审议会，也是国语审议会活动的最后10年。在最后这10年里，国语审议会主要对第一期国语政策实施以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和全面的审视，主要归纳出了三大层面的议题：语言层面、信息化层面、国际化层面。这三层面的问题的核心又暴露出了在“现代社会的敬意表达”、“表外汉字字体表”、“日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等方面所亟待解决的矛盾，这就要求国语审议会在制定语言规划时尽快适应新的时代，使得语言规划做到与时俱

进。

在语言层面的问题研究中,由于受欧洲近代语言理论的影响,日本社会对语言进行结构性研究的倾向一直占据主流。针对这个倾向有学者提出,结构性研究的弊端是将语言“系统化”或“制度化”,这种研究方式无法根本解决语言(特别是日语里面的敬语)里所包含的“心”(情感)的问题,也无法真正解释语言的真谛,因此必须重视日语使用的特性,尤其是敬语方面的问题。

在信息化层面上,随着打字机和电脑的出现,人们能够很简单地输入一些“常用汉字表”以外的文字信息,但是当时日本对常用汉字表以外的汉字尚未进行统一管理和规范,所以,不同型号的打字机或电脑打印出来的“非常用汉字”字体也就会出现差异。

1991年到2000年恰逢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这个时期也被许多日本人叫做“迷失的10年”,然而从国语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角度来看,这十年却可以叫做“大改革的10年”^①,因为日本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研究方向和观察角度上开始发生巨大转换,语言政策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例如,在与国际文化接轨的过程中,如何提高社会语言生活的质量和语言能力,用英语表示日本人名时如何排列“姓”和“名”的顺序,如何规范拉丁字母(罗马字)的书写方法,如何对待外来语的使用,如何处理外文翻译,如何在海内外开展日语教育,如何完善电子媒体以及提高日语的主体性地位等等,这些都被当作国际化层面的重要的问题一一提上了中心议程。此外,在组织机构方面,政策转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文化审议会”的成立。

2.4, 语言政策决策机构改组后对形势的把握与新的动向

2001年,日本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改组,原来的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如同其英文名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所示,文部科学省全面掌管日本的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行政工作。省内设立了“文化审议会”,接管了原来文化厅下属的四大分科会:“国语分科会”、“著作权分科会”、“文化财产分科会”、“文化功劳者选考分科会”。其中“国语分科会”则接管了原来国语审议会的全部工作。从此,国语政策就被人们当作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来提及。2001年,日本通过《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其中的第十八条就规定“国语是文化艺术的基础”。文化审议会强调,近年来日本社会的人性堕落问题严重,缺乏对他人的体恤之心,缺乏对美的感受、对家人的爱、对乡土的爱,对文化的爱,对祖国的爱等等,因此需要通过国语教育来矫正这些问题。这表明,在文化审议会的语言观念中,国语就是人格形成的基础,里面包含着爱国爱家的文化、传统和基础,国语在统合国民价值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重要的象征性作用,所以必须重视国语教育。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文化厅开始了一连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具体的国语政策推广活动。例如,面向广大民众开展“‘语言’体验活动”,并邀请活跃在第一线的导演、演员、朗读家、剧作家、诗人、和歌俳句创作家等为活动提供指导;发行“推荐美丽日本语”等包含有古典名作和现代名作的系列书籍,发行近代国语政策历史的详细资料集《国语施策百年史》,对国语政策的各种基础资料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并在文化厅的官网主页上予以公开,等等。这些具体措施较大提高了全社会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度和注意力,也反映了语言规划活动从宏观的、政策性为主的方向进一步转向微观的、具体的、

民众心理的层次。其中，提升国民语言能力特别是敬语的使用能力成为了关注的重点。因为在日语中，敬语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涉及到传统价值观与社会意识在语言结构层面的沉淀与建构这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21 世纪初期，在日本年轻人中出现了日益疏远书本和文字的倾向，中小学生学习能力也有所下降，这引起了广泛关注。鉴于此，2001 年国会甚至制定了“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2 年文部科学省大臣发表鼓励学生在学习、补习和做作业的“劝君多学习”的文章，同时文科省也研究制定了相应的具体促进措施。

当时文化审议会提出，提高语言能力“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开展“读书活动”和推进“国语教育”这两个方面。在“读书活动”方面，提出了要充实学校图书馆，加强读书指导，学校、家庭以及相关的团体要紧密配合等建议。在“国语教育”具体推进方面，从日本的行政系统自身特点来看，文化政策部门只是负责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执行则全权交给教育机构去处理，这在实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与原政策制定的初衷有所出入之处。

与此同时，书写规范的制定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动向。随着打字机和电脑的普及，“常用汉字表”以外的部分汉字日益成为民众常见的汉字，于是日本的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决定扩大“表外汉字字体表”的范围。面对这种现象，日本文化厅国语科曾表示，各领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汉字字体表的范围虽然无可厚非，但还是希望国民能尊重“常用汉字表”的精神原则。但是，在新形势下，人名专用汉字的字数也出现了大幅增长。这些都促使对原来的限制使用汉字的政策进行适时调整。2010 年 11 月 30 日日本公布了《改定常用汉字表》(2136 字)，新增了 196 字（如鬱、璧），删除了 5 个使用频率不高的常用汉字。这是继 1946 年、1981 年以来，第三次改定汉字表字数，以适应网络时代。

此外，早在 2000 年就曾强烈呼吁国语政策应该解决社会语言生活中的“敬意表达”问题，但是具体解决方针和实施方法等却没有深入讨论。直到 2005 年，相关机构才开始真正着手去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所谓国际化的推进，外来语渗透进日语的脚步却愈发势不可挡，外来语的使用现象甚至泛滥成灾。这也让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连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对铺天盖地的滥用外来语风潮颇有微辞。针对这些困扰，在原国语审议会的提议下成立的国立国语研究所在 2002 年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外来语委员会”来研究应对方案，并于 2003 年到 2006 年，四次提出了“外来语替代词”提案，专门创造了一些汉字词来取代原来以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自此以后，许多人和不少机关团体等也都开始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些“外来语替代词”，外来语泛滥的风潮也多少得以抑制。

针对学校教育中的外语教育问题，近十年来，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每年都对中学高中等英语教育的现状进行详细调查，对课程设置到外语教育时间、内容等进行改进，并且从 2011 年起在小学校全面实施“新学习指导要领”，即新的教育大纲，规定从 5、6 年级起作为小学生的必修课，每年要开设 35 课时的“外语活动”时间。这也是经过社会各界激烈争论后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这些动向显示出日本政府对英语教育的重视。文部科学省提出的口号是要培养“会使用英语的日本人”，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针，例如根据各学年教学内容设定英语水平考试合格者达标比例，通过开展演讲比赛等活动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增加校内以及授课中使用外语的机

会，提高教员的外语水平以及增加英语母语教员数量等等，其具体的调查结果数据等都会公布在文科省的官网上。在政策的导向下，全民对英语这个“国际共通语”的热衷程度也与日俱增。2000年，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的咨询机构甚至在一份报告中打出了“英语第二公用语论”的牌子，宣称这是为了让遭受泡沫经济打击的日本经济重新复苏，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一论调也招来了诸多质疑，因而不了了之。

3，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到70年代已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国际化的浪潮也随之到来。这时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扩张，同时开始谋求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和发言权，这就离不开在国际上扩大其语言的泛用性和认知程度，力图成为语言大国，甚至谋求与其他大语种抗衡，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在这种战略构思之下，日本政府在1972年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隶属于日本外务省，到了2003年，变更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日本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它在国内设有东京本部、京都分部和两个附属机构(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在海外2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2个事务所，和世界各国的驻外公馆、日语教育机构、文化交流机关等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关系。2012年至2016年其预算接近一千亿日元，单是“海外日语事业费”这一项目的预算支出就有两百四十多亿日元。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要在文化艺术交流、海外日语教育、日本研究·专业知识交流这三大领域里开展工作。基金会设立后，努力将日语向海外推广。下面仅对“海外日语教育”做一简介。

为增加日语学习者的数量，提高日语的国际地位，增进世界各国对日本的好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展了“学日语”、“教日语”、“关于日语教育的调查”等活动，致力于将日语推向全球。

为了在日语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和学习效果评估方法上给日语学习者或日语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实用有效的参考标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制定了一套“日语教育标准”，也被称作“JF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发了日语教材《まるごと 日本のことばと文化》、多媒体学习网站“アニメ・マンガの日本語”、网络影音教材《エリンが挑戦！にほんごができます。》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2013年为全球53个国家提供了日语教材、日语学习奖金等支助，同时，分别在全球31个地方举办了JF讲座，其中有16000人左右在通过该活动学习日语。鉴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护士、护理行业的劳力匮乏，自2008年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签署经济合作伙伴协议以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雅加达、马尼拉等地为即将赴日担任护士、护理师工作的东南亚国家人员提供日语研修服务。另外，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本国际教育振兴会等每年举办外国人日语辩论大赛，截至2015年，已经累计举办了56届外国人日语辩论大赛。针对外国人日语学习效果评估和日语能力资格认定的问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联合实施了“日语能力考试(JLPT)”。日语能力考试是以非日语语言为母语的人为对象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日语能力测试，始于1984年。项

自开始实施之初在 15 个国家设立了考点，当时约有 7 千人参加了考试。到 2011 年为止，已有来自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61 万人参加了这项考试。该考试项目的资格认定书为外国人在办理日本出入境手续和留日工作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还专门设立了用于支持海外日语学习者的附属机构“关西国际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开发教材、开展讲座、提供资助、提供研修、举办活动、统一考试、设立机构等方面下功夫，保障日语学习的环境和质量，提升外国人学日语的热情，以求吸引更多外国人学日语。

1989 年，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第二个附属机构的“日语国际中心”成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海外日语教师支援机构。到 2014 年为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全球各大洲设立了 146 个海外日语教育派遣岗，另外还为外国人日语教师提供 2 周到 3 年不等的日语研修活动，截至 2015 年，参加日语研修活动项目的外国人日语教师已超 1 万人次。同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还制定了详细的公开招聘项目，为有意参加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个人或者团体提供平台，并给予培训费、研究奖学金等支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通过设立机构、海外派遣、活动赞助、提供研修、积极招聘等方式来确保“教日语”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还大力开展“关于日语教育的调查”业务，该业务的内容主要涉及全球日语教育状况调查、全球日语教育机构检索、全球日语教育精英组织机构介绍等。

4，政府直属机构之外的有关民间组织

除了政府语言政策规划机构，还有不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机构组织参与到日本国家语言战略的组织实施之中，为日本语言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推广提供服务。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起飞，许多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开始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则适时提出将到日本学习的留学生数量增加到 10 万人的计划（后来又提出了 30 万人的目标）。这首先是意图通过增加日语学习者的人数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增加对日本的亲近感，提升其所谓的“软实力”。在这一国策之下，日本国内迅速出现大批“日语学校”，几乎全部为民办。其中有的具有较好的设备及教育资质，但也有很多滥竽充数，仅以牟利为目的，鱼龙混杂，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针对这种混乱现象，1989 年 5 月，日语教育振兴协会应运而生，在文部省的授权委托下开展对日语教育机构的资质审查、认定等工作，其设立的目的在于“提高和保证日本国内的日语教育机构的质量，以振兴面向外国人的日语教育事业，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

日语教育振兴协会主要开展了九项工作。概述如下。

- (1) 对日语教育机构资质进行审批。
- (2) 监督日语学校合法合理地接收留学生。
- (3) 提供并发行关于日语教育机构和日语教育的信息、资料。
- (4) 开展与日语教育有关的调查、研究和开发。
- (5) 举办研究会或研修会，提高日语学校教学水平。

(6) 促进日语教育机构和大学、专科学校等的合作。

(7) 为留学生等提供修学、生活指导和福利等支持。

(8) 为学日语的外国人提供关于入境和留日的建议。

(9) 为各地区的维持会会员活动提供支持。

除了日语教育振兴协会之外，还有其它各类组织纷纷成立，例如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国际日语普及协会、日语教育协会等等，它们分别开展各有特色的工作。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主要处理与留学生相关的福利问题，还参与留学生交流、语言能力考试等其他事务。国际日语普及协会的工作重点在于日语的教学。提出了“学习者第一主义”的主张，宣称要根据学习者的不同特点和需要，打造多样的日语学习项目，以提升外国人的日语水平。日语教育协会的工作重点则放在日语教育和学术交流、研修等方面。这些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推广日本语言活动及日本文化，从不同侧面推进国家语言政策的施行，可以说它们都是日本制定和推行语言政策的辅助性机构，最终形成了日本国家语言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些机构的详细情况，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一一详述。

5, 结语

人们往往忽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甚至连“日语”和“国语”这样的名称都不存在^⑩。也就是说，以“国语”，“日语”作为象征的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语言思潮和语言政策，直接服务于近代日本国家的建设和帝国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的历史中如果缺失了语言政策方面的记述，将无法正确把握它的全貌。例如，在日本海外殖民地统治过程中的语言战略以及语言观念，对于日本国内的语言问题也发生了极大影响。就连“国语”这个词，也是在其占领台湾之后，通过伊泽修二在台湾开办“国语讲习所”（1895），使用了“国语”一词之后，才直接促使在日本国内开始频繁使用，并固定下来。数年（1900）之后，通过立法规定，在小学校正式开设了“国语”课程。也是在这之后，这个词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国内的语言思想变革。类似这样的例证表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语言，文化思想等方面也与日本国内以及东亚地区有着深刻的互动作用。日本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对内和对外的语言战略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相互关系，对日本战后的语言规划和社会语言意识变化有着怎样的影响，也是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为探寻其间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进行准备。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语言规划工作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国家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例如法律法规，军令，国民教育用语等等，都涉及到标准用语的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产物，一种“标准语”或者“国语”可以说是统合日本国民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多年来日本政府不厌其烦地在标准语的制定、标记法的统一等方面做着大量的工作。甚至有人扬言，只要提高日本国民的“国语能力”，日本社会的所有裂缝将会得到修补，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是所谓的

国语万能主义。^①这种国语一边倒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少数语言的忽视和歧视的思想，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在日本的学术界也曾经受到严厉批评。

近年来，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逐渐关心起对日本境内的外国人进行日语教育及其母语教育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日语教育对象，主要涉及到定居日本的外国人及其后代这两个层次的群体。日本文化厅在此情况下，于2010年提出了“关于对‘定居日本的外国人’进行日语教育的标准性课程方案”，但是在如何对“定居日本的外国人后代”进行日语教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却始终未能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诸多日本学者所诟病之处。^②另外一个被诟病的地方，便是指日本政府“尚未意识到对日本境内的外国人进行母语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日本在该领域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这里所说的“母语”是指在日本定居的外国人的原居住国的语言。关于对日本境内的外国人进行母语教育的重要意义，有日本学者强调，其中的关键一点就在于这些外国人的母语所具有的“资源性”，这个外国人母语资源性的概念更早来自加拿大。因为对此缺乏认识和尊重，所以导致行政方面执行有关政策不力。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说，就是“外国移民为我们国家带来了他们国家的母语，这些语言资源充实了我们国家的语言环境，我们应该积极评价这些语言的到来”，“做好外国人的母语再教育工作不仅对他们自身（少数派）有好处，而且对我们（多数派）也有好处，因为它们是一种无形而宝贵的资源”。^③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动向，也值得我们关注。

2001年以前的国语审议会以及2001年以后的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主要承担着语言本体规划工作，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则主要承担着日本语言在海外的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活动工作。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等非官方组织多由学术界和政界的重镇出面组织，拥有大量政府资助，协助政府开展具体工作，因而，形成了官、民、学相结合的架构，以推行国家语言战略实施。可以说，这些不同的机构或组织从语言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出发，合力推动了日本语言工作的发展，共同构建了日本语言战略的整体框架。

日本的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在战后70年中，经历了几个大的转折，有相应的成败得失，存在许多被世人诟病之处，但是同时它也留下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资料和经验教训。尤其是在今天，从东亚整体的角度考察这段历史，更可以发现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东亚近代史进程中，战后具有特殊意义。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有可能冷静回顾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率先步入与西方接轨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其影响也辐射到周边国家。其中对西方语言观念，包括语言民族主义的引进，不仅对于日本，而且对于整个东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本通过扩张和侵略，取得东亚霸主地位，进而与其它西方帝国争夺权益，直至战败。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些动向基本可以说是按照吉田松阴在19世纪50年代设想的对外扩张的思路与指针推进的。福泽谕吉的整体思想虽然与吉田松阴有所不同，但是在对外扩张等方面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共同在对外政策上共同构建了日本战败之前110年的思想基础。这里面也包含了对东亚思想史进行回顾的重要启示。从语言思想的角度和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线索，日本语言规划则位于其延伸点的汇接之处。战后日本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带有其社会

特有的意识形态特色，与战后社会的发展以及日本国家地位的变化，有密切关联。值得注意与深思的是，面向国际形势，日本采取的一系列对应措施中，可以看到很多与近代中国语言政策的相似点或共同点。

有些日本学者对语言政策的中枢机构“国语审议会”所制定的方针和所做的工作提出过尖锐批评，在长期的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国语审议会”内部以及社会各界在也一直存在各种争论，有时甚至非常激烈，对其工作和成果等也是毁誉参半。但是，在绵密详尽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及适时应对社会语言生活新课题等方面，还是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还有可能从以下新的方向展开：国家利益与国家面对的内外关系对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在何种程度发生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与政策实际效果的关联性究竟如何？语言观念在其中发生何种作用？不同国家社会体制下是否有任何相同或类似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或影响？等等，这些将是今后开展亚洲各国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思潮史比较研究时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讲座教授·成蹊大学教授)

注

- ① 参照石刚《殖民地统治与日本語》三元社 1993年1月，《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研究》明石书店 2005年3月。
- ② 野村敏夫《国语政策的战后史》276页至281页。大修馆书店 2006年11月。
- ③ 陈章太《语言规划概论》商务印书馆 2015年5月 P 4
- ④ 委员会18名成员中，包括著名中国哲学家宇野哲人，汉学家诸桥辙次，语言学家安藤正次，时枝诚记以及语言政策专家保科孝一等各界有识之士。
- ⑤ 作为《当用汉字表》的补充，1951年又制订了《人名用汉字别表》，专门用于人名使用。
- ⑥ 《国语施策百年史》文化厅编 ぎょうせい出版。2006年1月。
- ⑦ 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岩渊悦太郎担任主查。
- ⑧ 《国语施策百年史》文化厅编 ぎょうせい出版。2006年1月。
- ⑨ 野村敏夫《国语政策的战后史》大修馆书店 2006年11月。
- ⑩ 石刚<東アジアの近代と言語認識>『成蹊人文研究』第22号 2014年3月
- ⑪ 安田敏朗<国语和日本語政策>出自《多语言社会日本：现状及课题》多语言化现象研究会编 三元社出版 2013年9月10日。
- ⑫ 参照平高史也<日本語教育>出自《多语言社会日本：现状及课题》多语言化现象研究会编 三元社出版 2013年9月10日。
- ⑬ 高桥朋子<移民の母语教育>出自《多语言社会日本：现状及课题》多语言化现象研究会编 三元社出版 2013年9月10日。

参考文献

- 田中克彦 1981《语言与国家》岩波书店
 石刚. 1993.《殖民地统治与日本語》. 三元社.
 野村敏夫. 2006.《国语政策的战后史》. 大修馆书店.
 陈章太. 2015.《语言规划概论》. 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庁編. 2006. 《国语施策百年史》. ぎょうせい出版.

多语言化現象研究会編. 2013. 《多语言社会日本：現状及課題》. 三元社.

安田敏朗. 2007. 《国语审议会：迷茫の60年》. 講談社.